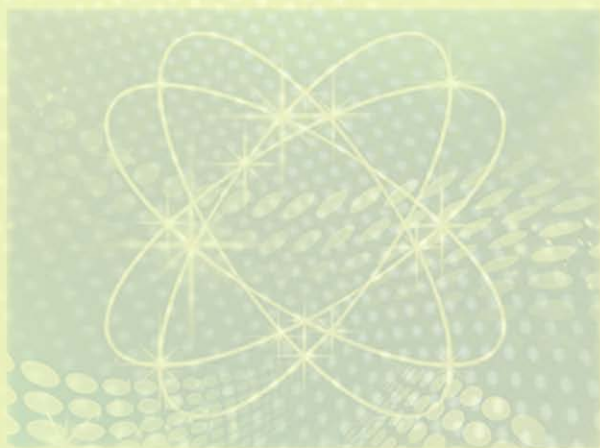


云南社科普及系列丛书·西南联大人物故事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联大常委梅贻琦

在巨幅帆布上描绘盛典的人

梅贻琦（1889—1962年），字月涵，天津人。早年在南开学堂学习，是张伯苓的学生。1909年10月，由游美学务处第一批派遣直接留美。1914年回国，在清华学校任教，后再次赴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回清华任教。1926年起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196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病逝于台北。他在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位极其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主要在于：他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10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却没有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他没有博士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统率清华的博士群体，而且大家对他极为敬佩。终其一生，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百年的历史，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被称为“四大哲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值暑假。当时清华一、二、三年级学生正在西苑兵营集中军训；毕业生因考学留校者二百余人，教职员除少数随梅贻琦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或有些作短期旅行外，大部分都滞留校内。事变发生后，学校里的加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庐山。7月14日，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和秘书长沈履给梅贻琦发出“和平绝望，战机已迫，盼设法绕道正太、平绥返校”的急电，梅贻琦感到心急如焚，但南京方面正在做教育领域应付战局的统筹安排。梅贻琦要在其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返程。17日，梅贻琦从庐山回电潘光旦等人：“今早重要会谈，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对地方当局极信赖维护。津方谈判早有传闻，且有卢线撤兵说，不知究竟何如。日内与蒋徐商，行程或先赴京再定……”7月28日，北平沦陷，学校师生纷纷向城内逃亡。梅贻琦由庐山抵达南京，但因交通中断不能北上。7月29日起，无耻的侵略者开始滋扰校园。至8月中旬，敌寇驻校达3000人，清华园完全沦入敌手。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梅贻琦受命于8月底由南京抵长沙负责筹备。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火逼近长沙，三校师生再次被迫转移。1938年4月26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

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汇合，改组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5月4日开始上课。当时，联大学生共993人，其中清华481人，清华教师职员除由湘来昆者外，尚有由北平直接南来的，共达200人以上。（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当时的西南联大，延续长沙临大的原有行政体系，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清华校长梅贻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学院院长和各处处长列席。三校校长中，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担任要职，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因此，在西南联大8年的时间里，主持校务工作的实际上是梅贻琦校长。

在战前，梅贻琦在清华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和“吾从众”的态度。那时，他处理问题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决不亲率表态。“在许多会议上，他一向只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却发言极少。在别人催促他时，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致许多性急而又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优柔寡断和不负责任，而了解他的人则



西南联大新校舍



西南联大校舍

常常善意地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但是，到了西南联大，众多的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异乡边陲，如何解决他们的食宿，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艰巨的任务。对此，梅贻琦一反常态，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果断的态度处理各种问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园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为母校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词》）虽然这段话是他对清华同仁说的，但却最充分地表达他在西南联大办学时的心情，也显示出他对前途的坚定信心。

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谈到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



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龙头街演出

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可以说，这种思想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教育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他办学的目的都围绕着：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认为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之所在，不学无术将使国家和民族限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为此，他坚持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他在1931年那次就职演说中还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这种主张突出强调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即使在物质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的西南联大，他也多方延揽，聘请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如唐兰、游国恩、李广田、张清常、卞之琳、袁家骅、向达、吴晗、王宪钧、陈康、洪谦、敦福堂、费孝通、钱锺书、吴泽霖、李树青、陶云逵等。对于学术自由，

他同样给予积极保障，据冯友兰回忆：“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冯友兰：《三松堂自序》）1944年，国民政府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一些“部订”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

在西南联大，对于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使西南联大成为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大学，梅贻琦进行积极的思考，先后完成《大学一解》《工业化前途与人才问题》《抗战期中之清华》等系列文章。在他的代表作《大学一解》中，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正如清华校友经常提到的：“梅校长……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



梅贻琦（二排右一）与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因此，在当年的西南联大校园，既有吴宓、钱穆等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者，也有陈序经等全盘西化论者；既有吴晗、闻一多、罗隆基等左派教授，也有周炳琳、姚从吾、陈雪屏等右派教授。之所以如此，正如朱自清所说，关键是有梅贻琦这样的“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长。

在《大学一解》中，他还强调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应该将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情操修养融入教育之中，他的“明明德”，就是要求学生有“自我认识和自我知能之认识”；他的“新民”思想则要求学生在校或是毕业以后，都能以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服务于社会，对社会风气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和促进。为实现“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梅贻琦提出适应社会需要培养“通才”的教育原则。“通才教育”就是要求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通识”，即“知识通达”的培养。他指出，为实现“新民”的目的，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必须一反当时教育中那种只注重专门知识培养的短视倾向，“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致，则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只不过人生之一部分”，而“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的中国，敌祸歧害日深，民众饱经患难，要改变这种面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用新的文化精神重构中国社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因此，“梅贻琦提出的‘通才教育’思想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社会，更新民族文化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思想的继续与发扬光大”（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的重要实践。

当然，梅贻琦也同样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西南联大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不仅在于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需要的知识宽广的杰出人才，而且也由于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专门人才，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专家、学者的摇篮。梅贻琦与潘



光旦合作撰写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就是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大贡献，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全面论述我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开山之作”。他们认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国家建设所需要之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其他的机构来解决。一是依托大学的研究院；二是兴办各类高级专门学校；三是通过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他们在文中提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这是工业化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

在重视培养“通才”和专门人才的同时，西南联大特别注重专业基础的训练。他们坚信，只有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因此，西南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专门设立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这一点，从当时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门课是当时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分别由钱穆、吴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来讲授。

可以说，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国家栋梁之才，西南联大学子中不少都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较好地平衡三校的关系，而且推动西南联大在战时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昆明时期，西南联大教职人员的工资虽随着生活指数的变化有一定的调整，但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涨，教职员的生活普遍困难。梅贻琦主张创办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教师的技术专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得的利润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同仁。

1946年7月31日，梅贻琦主持召开最后一次常务会议，他宣布“西南联合大学至此结束”。至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南联大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人们难以忘记，“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和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已经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如今，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不朽

的传奇，巍然屹立在岁月的长河中，梅贻琦和他的同事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已成为应举世追忆的独特遗产。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合影



联大常委蒋梦麟

边城昆明的离乱生活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由他代理。1928年任教育部部长，1930年冬重返北大任校长。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对学校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他治下，北大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1938年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1945年辞去北大校长，退出西南联大。主要著作有《西潮》（英文自传，后译为中文）、《孟邻文存》等。

蒋梦麟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中国大陆知道他名字的人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他的《西潮》和《新潮》在大陆发行不同的版本后，人们对他的认识逐渐深入，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建者之一，他“在中国首先倡导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以高等学术作教育的基础，培养活泼的、能生产的个人，以为家庭增资产，为国家求富强”（马勇：《蒋梦麟传》）为目标，几十年里始终不懈地为此而努力奋斗。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的3位常委之一，在边陲城市，他和他的同仁在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鸡鸣不已，为中国文化和科技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在长沙临大进入筹备阶段时，蒋梦麟抽空回到浙江余姚老家，那时他的父亲还健在，他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前可能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再回到故乡，因此，临行前他郑重地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他的父亲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火光血海，但是中国将赢取最后的抗战胜利。在抗战爆发两年后，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没有出现在父亲灵前。在故乡作短暂停留后，他立即回到南京，乘船赴汉口，再改乘火车到达长沙。在长沙，临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一起共赴国难，推进长沙临大的建设和发展。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多次遭到日寇敌机轰炸，经过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各项事件：1. 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

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 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加以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 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于是，蒋梦麟受托飞赴武汉，拜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他商谈联大继续迁往内地等诸多事宜，但陈立夫不赞成联大迁来迁去，无奈蒋梦麟直接面见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得到蒋的支持，决定长沙临大西迁昆明。

1938年1月，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蒋梦麟任主任，秦瓚为副主任。他与秦瓚、杨石先等教授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协调解决联大师生的校舍问题。为此，除先期租到的江西旅滇同乡会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龙云和云南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云南省教育厅奉龙云主席条谕发出训令，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临大筹备处借用”。但昆明校舍仍不敷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教室

用，蒋梦麟又亲往滇南蒙自进行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大后，仍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工作。常委会每周二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后来，各院、处长也列席会议。常委会逐步形成“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格局。1938年8月，西南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到南开大学原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欣然接受任命。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同年底，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开学，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新设的8个师范学院之一。

在昆明，学校安顿下来后，最令联大常委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的紧张及物价上涨造成的生活困难。据蒋梦麟记述：

“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 6 块钱一担（约 80 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 40 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 70 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 70 元。”（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为此，他和梅贻琦曾先后数次奔赴重庆，向最高当局面陈困难，争取经费给予补助。因此，在西南联大的常委会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记录蒋梦麟“在渝向当局商洽本校教职员米贴情形”“赴渝向教部接洽校务经过情形”“在渝接洽补助本大学教职员生活费用经过情形。（当局）为昆明物价高涨，特拨给本大学教职员生活补助费贰拾万元，已交由本人（蒋梦麟）带昆”等内容。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同，北大是国立大学，其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持；南开为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于自筹和捐助；清华的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庚子赔款支



西南联大教室

付，但由于抗战爆发，清华和南开的经费都受到严重影响，西南联大的全部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拨给。但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事业经费，将原核定的经费改按七成拨付。同时，规定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同样改为按七成发给（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相应地，西南联大教师的工资收入就十分有限。1941年11月，西南联大54位教授联名上书改善待遇，痛陈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但要求被国民政府无情拒绝。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友人帮忙，设法解决学校教师的生活待遇。

1939年秋，在蒋梦麟的积极斡旋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聘请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聘请罗常培、汤用彤、姚从吾、杨振声、丁声树、罗庸、唐兰、魏建功、游国恩等为导师，积极指导研究生展开研究工作，如殷焕先的《联绵字之研究》、王达津的《尚书与金甲文比较研究》、李孝定的《甲骨文研究》、高华年的《黑夷语研究》、胡庆钧的《川边宗教调查》、王利器的《吕氏春秋校注》、方龄贵的《元上都考》等，取得了一批优秀的成果。其中高华年的《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和阴法鲁的《词与唐宋大曲的关系》都获得教育部的学术奖励。到联大结束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共培养研究生22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

除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复习英文，同时开始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西潮》的原稿是用英文写成的，据他介绍，在抗战时期的昆明，他利用躲警报的间隙，陆续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全书共分为7部，在第一部中，蒋梦麟叙述他出生所在的旧乡村的生活、他幼年所受的传统教育、他的父母所给他的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他少年时期在绍兴、杭州和上海等地求学的经历；第二部叙述他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活；第三部和第四部叙述民国初年的知识革命和学生运动；第五部叙述他对中国生活的种种看法；第六部叙述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第七部叙述中国文化的若干重要特征及对抗战的看法。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对于该书，西南联大学生、历史学教授王德昭认为：“书中的每一页都闪耀着他的晶莹的智慧，缀以隽永的妙语和幽默的讽刺，佳趣洋溢，而且发人深省。”（王德昭：《评介〈西潮〉》）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西潮》中文本的出现，正是台湾被视为‘文化沙漠’的时代，无疑是一本具有重大吸引力与重大影响的书。在国内，特别是台湾农村青年，几乎人手一册”（王德昭：《〈西潮〉与〈新潮〉》——有关蒋梦麟先生撰写〈新潮〉的两封信》）。



《西潮》封面



《新潮》封面